

# 邓小平“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的论断及启示 ——基于复杂性科学视野

饶志华

(景德镇陶瓷学院 思政部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 邓小平“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的论断内涵十分丰富,基于复杂性科学视野,它体现了邓小平的整体思维、变化思维和关系思维。由于国际问题的不可预测性、国际问题中危与机并存,以及人们在认识国际问题方面的非理性等因素,导致我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有时可能会不够冷静。为了做到非常冷静地处理国际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不仅要努力做好充分的预判,摒弃一些错误的思维模式,还要大力加强把冷静作为一种领导力的培养,唯此,才能够做到有效地破解国际难题。

**关键词:** 邓小平; 复杂性科学; 国际问题; 冷静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4) 05 - 0009 - 05

##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ssertion “We Should Keep Calm When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Pointed Out by DENG Xiaoping Based on 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

RAO Zhihua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Jiangxi 333403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ssertion “We should keep calm when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by DENG Xiaoping is rich and reflects the overall thinking ,the changing think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thinking of DENG Xiaoping. Due to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coexistence of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nd the irrational factors i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we may occasionally not calm down when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To deal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very calmly ,we need not only to predict adequately and abandon some wrong modes of thinking ,but also to take the training of keeping calm as a way to foster leadership skills. If we accomplish the above things ,we can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effectively.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science of complexity; international issues; keeping calm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复杂性科学( complexity sciences) 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当代科

收稿日期: 2014 - 05 - 02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邓小平‘南方谈话’大众化研究”( 编号: MKS1314); 景德镇陶瓷学院自选课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大众化研究”( 编号: 景陶院发[2011]112 号文件)

作者简介: 饶志华( 1975 - ) ,男,江西金溪人,博士,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笔者认为,21 世纪国际问题是一个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用以还原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方法论显然不足以真正透析其内部的复杂性,只有创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才能更有效地剖析国际问题内部子系统之间复杂的制衡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建构复杂的科学应对策略体系。“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sup>[1] (P1366)</sup> 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所蕴含的复杂性思维特质,无疑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复杂的国际问题大有帮助。

## 一、“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的复杂性思维底蕴

“冷静”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指的是:沉着而不感情用事。<sup>[2] (P768)</sup>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是邓小平在长期处理国际问题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我党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形成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思维逻辑上来看,“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符合国际问题具有复杂性这一基本特征,与复杂性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

1.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体现了邓小平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在复杂性科学看来,事物的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当我们把整体还原为各个部分时,整体所具有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便不可能体现在单个的部分上。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既要善于把握事物的整体特征,又要充分关注个体的差异性。所谓整体性思维,就是在思考事物时,反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主张掌握问题的多方面,考虑各方面的特殊性。“多样性的统一性的逻辑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既不要把‘多’化解为‘一’,也不要把‘一’化解为‘多’。”<sup>[3] (P141)</sup> 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我国过去往往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使问题复杂化;在解决国际问题争执时,方法往往过于简单,采取了所谓“大批判”的斗争策略,结果却是越批判越不能够解决问题。处理国际问题时,头脑只有保持冷静,才能够既不会人为地、主观臆造地把国际问题复杂化,也不会有意识地把国际问题简单化。“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sup>[4] (P198)</sup> 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单从本国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出发还是不够的,还不能体现出邓小平的整体性思维,还应换位思考。“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sup>[5] (P351)</sup>

2.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体现了邓小平的变化性思维。变化性思维将国际问题看作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发展的、动态的过程。因此,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头脑只有保持冷静,才能够用变化性的思维来观察分析它。邓小平的这一思维方式,与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复杂性科学强调非线性思维的重要性,它认为事物的整体往往是由无限多样的、不可预测的和具有差异性的个体和变量构成的,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去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便捷化、因果化。而非线性思维则是一种直面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运用超越直线式的思维去力争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的思维方式,是认识复杂系统时理应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sup>[5] (P283)</sup> 处理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要随着国际问题的变化而变化,行动也要随之变化。“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sup>[5] (P283)</sup> “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sup>[5] (P59)</sup> 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不断变化的国际问题过程中,要在变化的思维中不断创新,力求用新办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sup>[6] (P132)</sup> 其实,创新也是正确处理国际问题的灵魂,还是变化性思维与时俱进的最佳体现,在不断变化的国际问题中创新处理办法。当然,“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还体现了邓小平在处理国际问题,沉着观察,以不变应万变。

3.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还体现了邓小平的关系思维。关系思维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均处于相互联系状态。关系思维反对将事物简单化的思考,主张考虑多方面的特殊性和内在关系,要求对任一系统的研究,必须从它的组成、序列、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和历史发展等多

个方面来考虑,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关系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复杂性思维,与复杂性科学是基本一致的。复杂性科学既强调整体论的重要性,又超越了整体论。它反对将复杂系统的组织化、目的性特征进行庸俗性、机械性的解读,主张在高度关注各构成要素的多样性、自组织性的基础上,进而揭示复杂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其要旨就是清楚地认识到国际问题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联,从而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从而形成比较和谐的国际关系。具体表现在国际问题往往与国内问题犬牙交错。如针对“六四风波”,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sup>[5] (P302)</sup> 所谓的“气候”,指的是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综合而形成的“环境”。这就说明,很多国际问题往往与国内问题遥相呼应。

## 二、“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的复杂性原因

在复杂性科学视野下,“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主观上的复杂性,即处理国际问题的准则的复杂多变性;二是客观上的复杂性,即国际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sup>[5] (P383)</sup> 国家利益从时间方面来分类,可以分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内容上来分类,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它利益;从层次来分,可以分为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并且,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可能转化,也就是说,非核心利益会转化为核心利益,眼前利益会转变为长远利益。可见,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是复杂多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国家利益的变化,往往与客观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充分认识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才能够做到处理国际问题时非常冷静,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 国际问题的某些不可预测性因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预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sup>[5] (P363)</sup> 这就是说,过去大多数国际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在于美苏两国争霸。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旧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处于一个新旧格局交替而又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际问题存在着较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国际间还很不安宁,世界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特别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sup>[7] (P366)</sup> “九一一事件及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给国际形势和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尽管事态本身仍在发展之中,还会有许多变数。”<sup>[7] (P367)</sup> 所谓“变数”,就是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地区,这给东亚地区国际问题增加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2012年4月10日,中菲发生黄岩岛对峙事件,局势一度升级,战争一触即发,美、日、韩、澳等国先后不同程度介入,事态更加复杂化。值此危难之际,更需中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对一切不良企图予以合理果敢有效的反击,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2. 国际问题中危与机并存性。“问题”就是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处理问题需要一定的代价,处理国际问题也是如此。如何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做到利益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在处理过程中保持冷静,掌握好处理国际问题的“度”。如果解决不好,不仅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发展,甚至会危及国内的政局稳定。当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sup>[5] (P354)</sup>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sup>[8] (P330)</sup> 也就是说,危机中有机遇,机遇中也有危机,只有保持冷静的头脑,清醒的认识,善于发现“危”和“机”的转

换,从而化危机为机遇,把坏事变成好事。而且,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机遇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很有可能会稍纵即逝。如果国际问题处理得不妥,机遇还有可能转化为危机。但由于人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由于某种信息掌握的不全面性、假定的不可靠性以及实施者的差异性等,造成了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有风险。为了尽量减少这种风险性,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我们不仅要冷静,而且要“非常”冷静!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等问题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自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做出的何其冷静而又睿智的判断。

3. 人的认识的非理性。所谓非理性,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包括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等等。人的认识是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认识方式的有机结合。人们在文学创作和科学技术发明时,需要找到灵感和兴趣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但是,非理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1993年邓小平在同身边人员谈及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时,曾表示“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sup>[1](P1366)</sup>“急”,体现了老年人的一种心态,也是一种非理性。它严重影响了人们冷静地处理国际问题。并且,人们在认识问题时,总会带上一些“情绪”和“情感”的因素,或者夸大成绩缩小问题,或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贬低自我能力。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本着对世界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判断,认为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避免,从而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把整个国民经济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氛围中扭转过来,摆脱了对世界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定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冷静”意味着要尽可能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干扰,避免情绪化的判断和决策,理性地分析复杂的国际问题,冷静地处理国际问题。

### 三、复杂性科学视野下“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的当代启示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仍然是今天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它的现实指导意义,获取它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复杂的国际问题。

1. 努力做好充分的预测。传统分析性思维认为,只要能够找到问题中决定性的因素,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对于这种简单性思维而言,复杂性思维认为,事物如果是复杂的,“那么是相对不可构造的,或者,更通俗地讲,是没有模式的”。<sup>[9](P130)</sup>“复杂性的方法要求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要忘记起整合作用的总体。”<sup>[3](P151)</sup>表现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复杂性的方法要求尽量从多方面去考察国际问题发生的各种因素,做到全方位的预测和准备。“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我们宁可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影响时间预想得长一点,把应对预案准备得充分一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sup>[7](P369)</sup>

2. 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要努力摒弃一些错误性思维。有学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sup>[10](P18)</sup>笔者认为,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根于“传统思维模式”有待于商榷,但中国传统的一些错误性思维确实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利于我国正确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具体来说,这些错误的传统思维模式表现在:概念模糊、缺乏逻辑性和求证性、缺乏思维工具的运用、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以后,我国又出现了辩证法的滥用,把“辩证法”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国际问题处理方面简单地主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矛盾思维,致使我们在国际问题处理方面出现很多失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人们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自觉

不自觉地认为一切国际冲突都是“利益”冲突,特别是物质利益冲突。其实,国际问题起因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sup>[11] [17]</sup> 面对当今国际间的冲突,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sup>①</sup> 所以说,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不能把国际问题简化为国际间国与国之间的物质利益争夺问题,而应当以一种复杂性思维方式来还原国际问题的原貌,才能正确地处理好国际问题。<sup>[12]</sup>

3. 加强冷静作为一种领导力的培养。只有冷静,才能够保证清晰的复杂性思维,才能拥有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正确思考能力。冷静常常能够产生智慧、产生信心和力量。以冷静的态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对于当今处理国际问题的有关部门及有关领导来说尤为重要。冷静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并非天生就具备,而是历经多次磨练才能提高。首先,要有清醒的头脑。“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sup>[7] [1574-575]</sup> 其次,要学会忍耐和克制,不感情用事。古人言“小不忍则乱大谋。”遇事能忍的自我克制修养,不意气用事,是国家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处理好复杂国际问题的必要修养。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下野后向邓小平请教如何“东山再起”,邓小平明确答道“忍耐和信仰”。正是这个“忍”字,中国破解了国外多次对我国的挑衅,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发展壮大自我的机会。最后,要多学习,增强智慧,增强冷静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领导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也要学习复杂性思维方法,才能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观察、思考问题,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做到冷眼观察国际事变,冷耳细听国际评论,冷情分析国际形势,最终达到冷静处理国际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年谱[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3] [法]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思想: 自觉的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4] 邓小平文选(卷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5] 邓小平文选(卷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6] 江泽民文选(卷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7] 江泽民文选(卷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8] 毛泽东选集(卷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维也纳] 约翰·卡斯蒂·维尔纳·德波利. 逻辑人生[M]. 刘晓国, 叶 闯,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楚 渔.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11]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12] 周利生. 祝黄河. 现状与展望: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系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6).

(责任编辑: 郭荣华)

<sup>①</sup> Vaclav Havel, “The New Measure of Man,” New York Times 8 July 1994, P. A27; Jacques Delors, “Questions Concerning European Security,” Addre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Brussels, 10 September 1993, P. 2.